

清前中期亳州的商业*

徐俊嵩

内容提要：清朝定鼎后，社会长期稳定。凭借便利的水陆交通，亳州的社会经济在清前中期有了长足的发展，逐渐成为皖北地区重要的商业城市，时人称之为“小南京”。亳州商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康熙二十年，中央在亳州设立分税口，该口成为凤阳关辖下较早设立的分税口之一；二是亳州的商税、牙税税额都居省内前列；三是亳州的街巷数量增长迅速，商品专业化程度高；四是亳州城内商贾云集，会馆林立，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关键词：清前中期 亳州 商业城市

亳州地处安徽西北部，黄淮平原南端，三面与河南交界，素有“南北门户，吴豫咽喉”^①之称，境内有涡河和淝水流经，是淮河水陆交通枢纽。明至清初，亳州长期隶属凤阳府。雍正二年（1724），亳州升为直隶州，下辖太和、蒙城二县。雍正十三年（1735），亳州由直隶州降为散州，后改属颍州府。亳州城建于宋真宗祥符年间，明宣德十年（1435）指挥周广将土城改为砖城并加修女墙，弘治年间加修城楼、角楼各四，城铺楼 54 个。雍正和乾隆年间的三次大规模修葺，基本奠定了亳城的基础：东西广二里二百余步，南北袤二里一百余步，周九里余，高一丈五尺。^② 因形如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博导许檀先生、邓亦兵副研究员以及硕导陈瑞研究员的指导，特此致谢。

① 乾隆五年《亳州志》卷1《疆域志上·城池·街市》，《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21），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第224~226页。

② 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卷1《城池》，《故宫珍本丛刊》第103册《安徽府州县志》第3册，海南出版社，2001，第29页B~30页A。

卧牛，亳城也被称为“卧牛城”。目前，关于清代亳州的商业，仅少数学者有所论及，但较为简略。^①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揭示清前中期亳州的商业发展实况。

一 清初的渐次恢复与发展

历史上，亳州素以军事重镇为世人所熟知，其军事地位远胜于经济地位。迨至明清，亳州逐渐发展为交通枢纽型城市。依靠便利的水陆交通，尤其是涡河的航运，亳州的商业迅速发展。志书中对其优越的交通条件每每言及，也足见时人对交通重要性的充分认识。如亳州与“豫州接壤，山陕通衢，是往来商贾、四方宾客毕集之地”；^② “亳州为中州门户，南北交途，东南控淮，西北接豫，涡河为域中之襟带，上承沙汴，下达山桑。百货輶来于雍梁，千樯转输于淮泗；其水陆之广袤，固淮西一都会”^③ 等。

明代时，亳州已是“商贾辐辏鳞集”的繁华都市，自城西北关及义门沿河一带，“楼舍攢拱联络，动计百家入境，望之弘敞巨丽，殊绝百城”。^④ 明末，“因水旱灾眚及兵燹之余，百姓逃亡，田地荒芜”，亳州的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明时近 7300 顷的耕地在清初已有 73% 成为抛荒地。^⑤

清朝定鼎后，社会长期安定，亳州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方志称其“工商交作，词讼简少，俗尚礼义，视昔为盛”。^⑥ 社会的稳定、水陆交通的便利，使亳州不但成为“五方之产不期而毕会，南北所需取给于立谈”^⑦ 的通都大邑，而且成为安徽、江苏、河南等省的商品集散

① 王鑫义：《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黄山书社，2001；陈瑞：《清代淮河流域商业重镇亳州境内的徽商——以乾隆、光绪〈婺源志〉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地方志》2008 年第 12 期；张光华：《清代亳州的社会救助体系》，《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6 期；李强：《明至民国时期亳州交通与商业发展》，《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5 期。

② 王鸣：《重修永清桥碑记》，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卷 12《艺文》，第 281 页 A。

③ 光绪《亳州志》卷 1《舆地志·形胜》，《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省府县志辑》第 25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 56 页 B。

④ 嘉靖《亳州志》卷 1《田赋考》，嘉靖四十三年刻本，第 52 页。

⑤ 《田赋考八》，顺治《亳州志》卷 1，顺治十三年刻本，第 50 页。

⑥ 《版舆图二·风俗》，顺治《亳州志》卷 1，第 18 页。

⑦ 光绪《亳州志》卷 1《舆地志·郡邑》，第 48 页 B。

地，极大地便捷了商品的流通和长途贩运。

因地处扬州和豫州水陆交通要道，亳州备受富商大贾青睐，繁荣景象不下南京，因而又有“小南京”之称。亳州的花卉种植在明清两代十分兴盛，其中以牡丹和芍药为最，文人墨客在赏玩之余也留存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作。早在嘉靖时，亳州“环城十里之内百果杂植，蓊蓊葱葱，名园四出，奇葩艳林多所未睹，春夏之交灿若锦屏，周匝所最佳者如牡丹王家红、佛头青，芍药之莲香、白观音……”^①明代时亳州已是牡丹的栽培中心，亳州牡丹擅名海内，除了药用外，观赏牡丹也很多，像“御衣黄”“集翠蕊珠”等都是全国闻名的佳品。牡丹的种植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因而种植规模十分庞大。徐乾学有诗曰：“谯城连延三万户，北枕涡流跨城父。……惟有巍峨元（玄，避讳）武门，舟车络绎通商贾。”^②牡丹之外，芍药的种植也极可观。清人刘开有诗云：“小黄城外芍药花，十里五里生朝霞。花前花后皆人家，家家种花如桑麻。”^③芍药的种植已与桑麻无异，可见其种植之广泛，规模之大也可以想象。亳州的芍药种类繁多，花也大于他处，为亳州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据清代诗人周光邻称，“谯阳（亳州）芍药最盛，花时论担而售，计十钱可得百余朵”。^④

花卉的种植既直接增加了经济收益，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亳州商业的繁荣。早在康熙年间，文人钮琇对亳州商业的繁盛就有这样的描述：

亳之地为扬豫水陆之冲，豪商富贾，比屋而居，高舸大编，连樯而集。花时则锦幄如云，银灯不夜，游人之至者，相与接席携觞，征歌啜茗，一椽之馔，一箸之需，无不价踊百倍，浹旬喧宴，岁以为常。^⑤

① 嘉靖《亳州志》卷1《田赋考》，第55页；《土产》，顺治《亳州志》卷1，第88页。

② 徐乾学：《支园牡丹歌》，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卷12《艺文》，第323页A。

③ 刘开：《偕陈丈晚香任硯香至城东观芍药复作长歌》，光绪《亳州志》卷18《艺文志》，第513页B。

④ 周光邻：《芍药》，光绪《亳州志》卷18《艺文志》，第508页B。

⑤ 钮琇：《觚觚》卷5《豫觚·牡丹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89页。

钮琇道出了交通之于亳州的重要性，也点出了花卉种植对亳州商业的促进作用：每值花期之际，四方游人往来如织，宴乐赏玩，昼夜不息，极大地刺激了亳州的消费，城内物价一时因之飞涨。钮琇的描述虽不免有些溢美之词，但也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当时亳州的繁盛景象。

正是基于亳州商业的迅速发展，税收也越发可观。康熙二十年，清政府在亳州设立税口。该口是凤阳关辖下较早设立的分税口之一，直到咸丰初年才因兵燹而废。^① 亳州口有上下二关，上关在仁和街，征落地税；下关在张家桥，征货船税，都在涡河北岸附近。^②

二 清中期的继续发展

清中期，亳州的商业继续发展，更胜清初，尤其是涡河近城北一带，更是“商贾百货所聚集”。^③ 亳州商业的发展，既表现在居于全省前列的商税、牙税^④税额上，也表现在街市数量的持续快速增长上。

1. 清代亳州的商税、牙税

亳州口是凤阳关下重要的分税口之一。清初凤阳关仅有正阳和临淮二关，乾隆时期凤阳关收税口已增至 11 处，包括正阳大关，临淮、怀远、盱眙、亳州四大口，新城、涧溪、长淮、蚌埠、符离、睢河六小口。

亳州是淮河水陆交通枢纽，也是淮河沿线南北货物的重要集散地之一，往来商货络绎。亳州口负责征收过往水旱商税，无论大小商船及陆贩货物，均按旱贩则例征收。在别口报税的货物，本口不重征；在本口发卖的货物则征收落地税；他口只征船料税的，本口照货征税。^⑤ 据乾隆

① 光绪《亳州志》卷 6《食货志·关榷》，第 135 页 B。

② 道光《亳州志》卷 19《食货志·关榷》，《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安徽省第 664 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第 785 页。

③ 王鸣：《重修永清桥碑记》，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卷 12《艺文》，第 280 页 A。

④ 此处的商税、牙税与今日之商税、牙税并非同一概念。今日的牙税属于商税的一种，后者包括前者；亳州的方志中，商税、牙税都是杂课的一种；乾隆《江南通志》中，商税、牙税、田房税、花布牛羊税、典税等，也都是杂税的一种，商税和牙税属于并列关系。本文的商税、牙税即属后者。

⑤ 乾隆《户部则例》卷 77《税则·凤阳关》，《故宫珍本丛刊》第 285 册，海南出版社，2000，第 261 页 A。

年间的税则统计,亳州口征收衣物、食物、用物和杂货四类商品,其中衣物 11 种,食物 11 种,用物 27 种,杂货 13 种,共计各色商品四五百条。^①

亳州的商业以药材、铁货为主,兼以南北杂货。亳州是重要的药材集散地之一,这从亳州境内会馆的经营行业也可看出(参见表 3),境内及邻近府州的药材也经由亳州中转。据李刚研究,山陕商人除了将西口药材贩运到亳州外,还大量贩卖亳州特产亳芍、亳菊、柔白、瓜蒌、槐米、二丑等名贵药材到西部各地。^②铁货主要由山西的泽潞地区输入,如明末山西阳城商人李思孝专以贩铁为业,在开封、周口、亳州、曹州等地皆有铺户,有资产数十万两。^③乾隆年间,山西潞安府长治县八伯镇,“该镇居民共五百余户……多在安徽贸易”,^④在亳州经商的当也不在少数。杂货的一条重要渠道是从江苏回空粮船捎带,“向来河南货物由颍河、涡河舟运至此(长淮集)上岸,陆路至浦口发往苏杭,亦有苏杭绸缎、杂货由浦口起,早至长淮雇船运赴颍、亳、河南等处”。^⑤

亳州口的税收尚无明确记载,仅可从一些资料中窥其大略。据康熙《大清会典》记载,康熙二十五年凤阳关定额 79839 两,其中包括正阳关、临淮关原额及加增额共 3 万两,还包括康熙二十年并征亳州、盱眙税课 41115.83 两。^⑥亳州的商业地位无疑超过盱眙,税收自然也应该高出盱眙,保守估计亳州的税收应在 2 万两以上。

乾隆年间两江总督高晋奏称,“该关(凤阳关)共设税口十一处,内正阳一处为大关,临淮、怀远、盱眙、亳州四处为大口,新城、涧溪、长淮、蚌埠、符离、睢河六处为小口……新城等处六小口止赖凤属之宿州、虹县及泗州等处本地米豆出口,纳税原属无多”。^⑦乾隆年间凤阳关税务卓尔岱指出,“凤阳关各处小口每年约收银八九万两不等……惟正阳

① 乾隆《户部则例》卷 77《税则·凤阳关》,第 261~266 页。

② 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第 402 页。

③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第 24 页。

④ 故宫博物院编《史料旬刊》第 3 册第 28 期《秦功德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第 583 页。

⑤ 乾隆《凤阳县志》卷 3《舆地志三·市集》,第 13 页。

⑥ 康熙《大清会典》卷 34《户部·关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3 编第 72 辑第 715 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第 1597 页。

⑦ 《两江总督高晋折》,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

大关每年约收银二十万两上下”。^① 据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凤阳关的税收主要来自正阳大关及四大口，六小口的税收十分有限，正阳大关在乾隆年间的税收每年在 20 万两上下，四大口每口年均征银当在 2 万两上下。

根据以上材料，亳州口的税额在康熙时已经达到 2 万两，乾隆时期是凤阳关税收的最高期，因而亳州口的税收应该超过 2 万两。当然，税口所征税额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亳州商业的发展，商人的偷漏及官员的侵吞都会严重影响税额。

除了国家在亳州设立的关税分税口外，亳州的地方商税和牙税税额也居全省前列，属于安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表 1 是依据《大清会典》以及部分安徽方志整理出来的清前中期安徽部分州县商税、牙税情况一览。

表 1 清前中期安徽部分州县商税、牙税情况一览

单位：两

朝代 地区	康 熙		乾 隆		嘉 庆		道 光	
	商税	牙税	商税	牙税	商税	牙税	商税	牙税
怀宁	137. 025		137. 025				142. 545	
宣城	146. 418		146. 418	256. 35	141. 695	256. 35	141. 695	
芜湖	96. 160		96. 160		96. 160			
定远	110. 195		110. 195					
阜阳	商 籍（曲） 税银 451. 6		商 籍（曲） 税银 451. 6					128. 7
寿州	407. 255		407. 255	174. 6		174. 6	381. 563	174. 6
亳州	114. 616		114. 616	961. 3				698. 3
盱眙	商税地契银 94. 94		商税地契银 94. 94					
安徽		5394		8030. 76		8444. 1		

注：表中所选州县，皆为安徽省商税、牙税税额居于前列的州县。其中，阜阳的商税也较高，但因是商曲税合计，故无法得知其确切的商税税额。

资料来源：康熙《江南通志》卷 18《田赋》；乾隆《江南通志》卷 72《食货志·田赋》；道光《安徽通志》卷 58《食货志·杂课》；康熙至道光年间部分安徽方志。

① 《庐凤道兼管凤阳关税务卓尔岱折》，乾隆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台湾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 23 辑，台北，台湾故宫博物院，1982，第 38 页 A。

清代,安徽的商税和牙税基本实行定额制,除部分州县外,不同时期的商税和牙税基本保持不变(其他未列入的州县也是如此)。二税的相对稳定,使我们较难从动态上考察不同时期各州县商业的发展变化实况,仅能提供一个相对的参照数据。

寿州是凤阳关大关正阳关所在地,从商税来看,其商税高达400余两,居安徽省第一(二)位,^①远高于其他各州县。即便是省治所在地的怀宁以及安徽的另一税关城市芜湖,都与之相差甚大。亳州的商税尽管与寿州相去甚远,但与其他各州县差距较小,仍是省内商税较高的州县之一。

牙税是政府对牙人牙行这些市场贸易的中介商所征的税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就牙税来看,亳州的牙税在乾隆年间额征961.3两,占整个安徽省的12%,是同期寿州的5倍多,是宣城(安徽省牙税额第二)的3.7倍。亳州的牙行在雍正年间开始定额,共1400余家,分上中下三则纳税,“上则完税八钱,中则完税七钱,下则完税六钱”。^②由于牙行实行定额,乾隆朝的牙帖数和牙税额与雍正朝完全一致,因而乾隆朝的牙帖量和牙税额无法如实反映亳州商品经济发展的实况。但毋庸置疑的是,乾隆时亳州商业的发展程度已经远超此前。“乾隆四十三、四、五及四十九、五十二并嘉庆三年,节被黄水成灾,城关四厢集场多被冲没,牙户逃亡;嘉庆十八九及二十四、五年复又连遭水灾,逃亡更甚……逃亡牙户三百九十三名”,^③以致道光时该州实收牙税银仅698.3两,减少了27.4%。亳州牙税的大幅减少,并非其自身商业经济发展的停滞或衰落,而主要是水灾所致。

亳州商业的繁盛,远远超过与之平行的各散州以及一些府治,即便是省治所在的怀宁县,其商业状况都与亳州相去甚远。在安徽的市场网络体系中,芜湖、正阳这两大中央税关所在的城市无疑是居于最高层级的流通枢纽城市,亳州则发展成为仅次于它们的地区性商业城市。

2. 亳州的街巷

清前中期,亳州的街巷数量较清初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以下是根据清代亳州方志整理出来的亳州各区街巷数量,参见表2。

① 阜阳的税收数据是商税与曲税合计,因而无法判断其商税的税额是否超过寿州。

② 道光《亳州志》卷19《食货志·杂课》,第786页。

③ 道光《亳州志》卷19《食货志·杂课》,第786~787页。

表 2 清代亳州各区街巷统计

位 置	乾隆五年	乾隆三十九年	道光五年	光绪二十年
城中	24	50	56	56
北关	33	32	57	57
河北		19	40	14
城治沟西	/	/	13	5
南关外	1	4	5	5
东关外	3	3	5	5
西关外	1	2	4	4
亳州（合计）	62	110	180	146
增长率（%）	100	77.4	190	135

资料来源：乾隆五年《亳州志》卷1《疆域志上·城池·街市》；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卷1《城池·街巷》；道光《亳州志》卷9《輿地志九·街巷》；光绪《亳州志》卷2《輿地志二·街巷》。

由表2可知，乾隆五年，亳州已有街巷62条，其中城中24条，北关、河北共33条，东关外3条，西关外1条，南关外1条。乾隆三十九年，亳州的街市增加到110条，其中城中50条，北关32条，河北19条，东关外3条，南关外4条，西关外2条。道光五年，亳州的街巷数量高达180条，达到历史最高，其中城中56条，北关57条，河北40条，东关外5条，南关外5条，西关外4条。如果以乾隆五年的街巷基数为100计算，乾隆三十九年已达到177，道光五年则增长到290，其增长速度可见一斑。

街巷因商业的发展而设立，亳州的街巷在布局上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亳州城内主要是官绅聚居区，也是亳州的行政中心。亳州的商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涡河的航运发展起来的，北关和涡河北岸是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北关是主要商业区，店铺、会馆林立，街巷也多是以行业 and 商品命名的专市；河北则主要为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地理上的集聚一方面降低了商品的价格，能更好地满足居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减少了运输成本，为商品的中转批发提供了便利。

亳州在乾隆以前就形成了专门性的商品街市：“北关以外列肆而居，每一街为一物，真有货别队分气象，关东西，山左右，江南北，百货汇于斯，分亦于斯。”^①如乾隆三十九年，北关外大街上的商品中，衣帽类有白

① 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卷10《风俗》，第202页A。

布街、帽铺街,竹器有竹货街、爬子巷、筛子市、席市,纸张有纸坊街,瓷器有瓷器街,药材有花子街(亳州称白芍为花子),牲畜有牛市、猪市街、羊市,此外尚有姜麻街和干鱼街。^① 这些商品既满足本地市民的日常消费,又可供中转批发,商品来自附近州县以及湖广、江浙、河南等省。与乾隆初年相比,30 多年内,亳州的街市数量增加了近 1 倍,数目惊人。到了道光五年,亳州的街巷数量高达 180 条,几乎是乾隆五年的 3 倍,专业街市也增加了许多,瓷器市、姜麻市、猪市和驴市都增加到 2 处。^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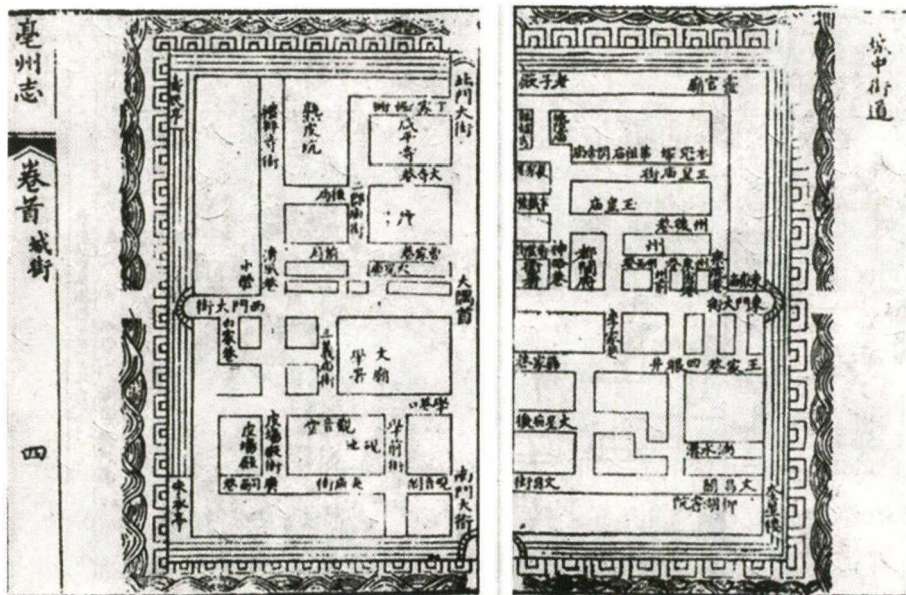


图1 乾隆三十九年亳州街道

图片来源: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卷首《图》,第13页B~14页A。

三 商人与会馆

亳州居民多勤于农桑,少事工商,“商贩土著者什之三四,其余皆客户”。^③ 外商既多,自然“集百货之精”,居民耳濡目染,因而服食器用也

① 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卷1《城池·街巷》,第32页A。

② 道光《亳州志》卷9《輿地志九·街巷》,第293~318页。

③ 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卷10《风俗》,第202页A。

夹杂五方的习俗。^① 亳州作为江北的一大都会，^② 交通极为便利，商业极其发达，汇集了安徽、山陕、江西、浙江以及福建等省商人，其中尤以徽商和山陕商人居多。^③ 这些商人人数众多，行业各异，实力雄厚，并且多建有会馆。表 3 是据方志资料整理出的各省商人在亳州所建会馆的情况。

表 3 亳州主要会馆情况一览

会 馆	位 置	兴建时间	商帮及经营范围
山陕会馆（关帝庙）	北关涡河南岸	顺治十三年（1656）	山陕商人 药业、铁业
徽商会馆（朱文公祠）	北关外门神街	康熙八年（1669）	徽商 药业、竹木、文房四宝
宁池会馆（金龙四大王庙）	北关外火神庙街	乾隆五十八年（1793）	宁国、池州二府客民 药业
闽商会馆（天后宫）	北关外爬子巷	乾隆元年（1736）	福建汀邵客民
楚商会馆（禹王宫）	天棚街		药业
药商会馆（三皇庙）	铁果巷西	雍正十年（1732）	药业
江西会馆（许真君祠）	打铜巷	乾隆五十八年	江西客民 药业
染商会馆（葛仙祠）	永和街	咸丰元年（1851）	染织业
江宁会馆	河北		江宁商人 药业
旌德会馆	城西北三十里		旌德商人 药业
浙江会馆（自在园）	城东二里	道光五年（1825）前	绍兴商人 药业

注：部分商帮经营行业据 1996 年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亳州市志》补入。
资料来源：根据乾隆五年、三十九年《亳州志》，道光《亳州志》，光绪《亳州志》整理。

亳州的安徽商人主要有徽商、宁池商人，其中以徽商人数最多，财力最为雄厚。徽商在宋元时已开始在淮河流域经营，明代婺源商人查一樽，“商亳之荆山……岁歉，待公举火者奚啻百家”。^④ 清代则有更多的徽商来到亳州经营，这些商人中许多还有功于地方，得以跻身方志中人物传的义

① 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卷 10《风俗》，第 202 页 A。
② 孙维龙：《重修咸平寺碑记》，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卷 12《艺文》，第 278 页 B。
③ 关于亳州的徽商，主要有以下成果：卞利《徽商与明清时期的社会公益事业》，《中州学刊》2004 年第 4 期；王裕明《明代前期的徽州商人》，《安徽史学》2007 年第 4 期；陈瑞《清代淮河流域商业重镇亳州境内的徽商——以乾隆、光绪〈婺源县志〉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地方志》2008 年第 12 期。
④ 《婺源查氏族谱》卷尾 1《行实》，光绪十八年刻本。

行一类人。^①如“曹金祖,号碧潭,清源人,客亳州;詹一滨……弱冠商亳,稍获赢资,与胞兄一淳均半经营,无吝色。康熙四十八年亳大饥,钱米周赈约五百金;次年亳疫,施棺二百余具、席数百,掩埋无算;詹至中,卢源监生,少孤,家贫,长商于亳”。^②黄天仪,名维玠,“先世自歙迁亳……盖六世于兹矣”,是侨居亳州的歙县徽商后裔。乾隆丙子(1756),亳州大饥,“出所储粮二千余石,减市价十之一,豆饼二万片……亦减价以市”,^③贫民得济尤众。“詹轸元,(婺源)庐坑人,少孤贫,远贾于亳。”^④再如程箕昌,“国学生,起家于亳”;^⑤詹隆桢,“中岁贾于谯,资稍裕,喜施与……道光壬癸间,亳荒,捐千金助赈,全活多人”。^⑥亳州三障庵旁所建义冢,系徽州人詹湟与其子良毓买地所置。^⑦再如婺源查世祈,“服贾江北……亳之会馆、义冢皆赖以经营”。^⑧

亳州的外商以山陕商人居多。如临汾商人杨昌年,生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业商于亳州”。^⑨除了只身来亳经营者外,有些晋商甚至举家迁入,如亳州郭氏。其“先世本山西沁水县籍,明正德间有名璟者迁于亳,遂世为亳州人”;郭氏遭太平天国之乱后,家道中落,郭莹山只得与弟玉珙“弃儒而贾以事生计”。^⑩亳州的大关帝庙(即山陕会馆)就是由山西、陕西药商所建。据乾隆三十二年(1767)《重修大关帝庙碑记》记载,大关帝庙建于顺治十三年(1656),“首事王璧、朱孔颖,皆籍系西陲,西行

① 王裕明认为徽商在淮河流域一带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历史可追溯至宋元,尤其是元末。参见王裕明《明代前期的徽州商人》,《安徽史学》2007年第4期。陈瑞对清代亳州境内婺源籍的徽商进行了考察,参见陈瑞《清代淮河流域商业重镇亳州境内的徽商——以乾隆、光绪〈婺源县志〉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12期。

② 道光《徽州府志》卷12《人物志·义行》,第1201页B、第1205页B、第1208页B。

③ 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卷8《人物》,第170页A。

④ 乾隆《婺源县志》卷33《人物十·义行三》,《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安徽省第677号,第1515页。

⑤ 光绪《婺源县志》卷34《人物十·义行三》,光绪九年刻本,第4页。

⑥ 光绪《婺源县志》卷35《人物十·义行八》,第26页。

⑦ 光绪《亳州志》卷4《营建志二·寺观》,第120页A。

⑧ 《婺源查氏族谱》卷尾之4《行实》。

⑨ 《杨氏历世实录》,临汾《杨氏家谱》,乾隆十四年。

⑩ 民国《亳县郭氏宗谱》卷3《艺文·江苏候补知县郭君莹山家传》。

于亳，求财谋利，连袂偕来，亟谋设会馆，以为簪盖之地”。^① 山陕会馆地处商业繁荣的北关咸宁街，北临涡水，南依城郭，占地 3200 平方米。会馆建筑秀丽，雕绘精绝，有钟鼓二楼、大殿、戏楼、山门等，仅山门外山陕药商进献的一对铁旗杆就高 16 米，重 1.25 万余公斤，足见昔日山陕商人之豪富。此外，亳州的一些庙宇也曾得到西商的资助。如岳王庙在北关太平桥南，建于康熙十六年（1677），乾隆三年（1738）由山西凤台县商人所开商号董全兴续修。^② 亳城东南郊 0.5 公里处的白衣律院修于顺治初，乾隆二十五年（1760）山西富商董继先捐资修建环殿经楼、藏经楼及厢房等。^③

此外，亳州尚有福建、江西和江宁等处商人，但其事迹较少，仅有会馆留存。如“天后宫在北关外爬子巷闽商会馆”；^④ “许真君祠在打铜巷，旧志云在猪市巷，改名万寿宫，乾隆五十八年江西客民建为会馆”。^⑤ 嘉庆十八年，亳州遭遇黄灾，知州李尧文在城内设二处粥厂，其中一处便设在河北江宁会馆。^⑥

嘉庆十八年九月，亳州暴发大水，不但城墙被冲坍 29 丈，而且“黄水冲坏仁和、顺和二街，漂没两岸并附城民舍数十万间”，^⑦ 灾情极其严重。为了赈济灾黎，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员到商人、市民都积极投身于赈灾活动。其中，涉及商人捐款的仅有龙兴号德中盐店；捐粮的商户较多，有典商 7 家，董全兴、李沛兴、刘和合、牛全顺、牛全高、武衡茂、晋统昌、董恒昌、薛万泰各号以及玉成、交泰、中和各钱店。^⑧ 此次赈灾涉及盐商、典商、钱商和董全兴等 9 家商号。这些商号中，董全兴是山西凤台县商人所经营，其他商号是何省商人开设则不得而知。

① 转引自侯香亭、梅开运《花戏楼》，政协安徽省亳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亳州文史资料》第 5 辑，1992，第 116 页。

② 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卷 3《坛庙》，第 56 页 B。按，嘉庆十八年（1813）亳州的救灾中，有董全兴商号的捐粮，它最迟在雍正年间已经来亳经营，由此可知董全兴商号在亳州存在的时间较长。

③ 光绪《亳州志》卷 4《营建志二·坛庙》，第 115 页 B。

④ 乾隆三十九年《亳州志》卷 3《坛庙》，第 57 页 A。

⑤ 光绪《亳州志》卷 4《营建志二·坛庙》，第 113 页 B。

⑥ 光绪《亳州志》卷 6《食货志·蠲赈》，第 151 页 A。

⑦ 道光《亳州志》卷 40《杂志一·祥异》，第 2134 页。

⑧ 道光《亳州志》卷 20《食货志·恤政》，第 832 页。

除了地域性的商人会馆外,还有一些行业会馆。亳州的药商会馆位于铁果巷西面,雍正十年(1732)由药商修为会馆。^①亳州盛产药材,是全国著名的“四大药都”之一,药材也是亳州的大宗商品之一。顺治时,亳州的药材就有27种之多,道光时增加到44种,且不包括花类和草类。^②据乾隆《户部则例》记载,亳州口的早贩杂货税则中,仅药料就有近130则,即近130种药材需要征税。^③亳州人称白芍药为花子,乾隆五年刊刻的《亳州志》中,亳州的街市已有花子街,这是以白芍为主要商品的专业性街市。^④商人在选择最优经营地的时候,通常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亳州丰富的原料以及便利的交通,大幅度降低了原料采买和运输成本,这也是亳州能成为明清时期重要的药材集散地之一的主要原因。

汉族商人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商人在亳州经商。据资料记载,现在的亳州市仅清真寺就有十几座,其中最早的北京寺始建于元至正年间(1341~1368)。^⑤逮至乾隆五年,亳州街市中已首次出现礼拜寺街。^⑥道光五年,亳州又出现另外二处清真街巷:大街西,“西北曰礼拜寺”;河北大街,“东门通大河曰清真巷”。^⑦礼拜寺街、清真街、清真巷主要是回族、维吾尔族的聚集地,可以推测乾隆以前已有不少回族、维吾尔族的商人在亳州经商;至嘉道时,又有更多的少数民族商人进入亳州。

结 语

清前中期,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亳州凭借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商业较明代有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淮河沿线重要的商业城市 and 商品流通集散地,也成为安徽境内重要的地区性商业城市。亳州商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亳州口是凤阳关下重要的分税口之一,地方商税居于全省前列,牙税

① 光绪《亳州志》卷4《营建志二·坛庙》,第113页A。

② 《土产》,顺治《亳州志》卷1,第87页;道光《亳州志》卷21《舆地·土产》,第849~852页。

③ 乾隆《户部则例》卷77《税则·凤阳关》,第264页B~265页A。

④ 乾隆五年《亳州志》卷1《疆域志上·城池·街市》,第226页。

⑤ 陈乐基主编《中国南方回族清真寺资料选编》,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第265页。

⑥ 乾隆五年《亳州志》卷1《疆域志上·城池·街市》,第225页。

⑦ 道光《亳州志》卷9《舆地志九·街巷》,第305、310页。

额更是全省之首；乾嘉道年间，亳州的街巷数量增长迅猛，并较早地形成了一物一街的专业化格局；亳州城内会馆林立，富商大贾云集，呈现一片繁盛景象。随着商业的发展，亳州的城市功能完成了由军事城市向流通枢纽型经济城市的转变。清代亳州商业的发展，改变了亳州的城市场貌，加速了居民区和商业区的分化、商品专业化格局的形成，丰富了城市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使亳州成为皖北地区举足轻重的商业城市和商品流通枢纽。

作者：徐俊嵩，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

（编辑：张献忠）